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新兴中等强国的 战略选择：以土耳其为例^{*}

邹志强

【内容提要】 当前，大国竞争全球化、地区冲突外溢化与技术合作政治化等因素共同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给新兴中等强国带来挑战。中等强国不愿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坚持战略自主意味着独自面对复杂挑战。同时，中等强国不得不随着大国竞争重心的变化而调整政策。虽然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受到各方高度重视，积极进取、多元平衡的务实外交政策成效显著，但其既受制于自身实力的不足，也面临新一轮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挑战。土耳其在大国竞争中角色尴尬，既面临选边站队压力，又无法获得各方信任；在空前复杂的地区冲突中难有作为，其平衡外交空间因俄乌冲突而被大大压缩，也无力塑造巴以冲突前后的中东秩序；全球能源格局重组威胁到土耳其能源枢纽愿景，国际技术竞争的政治化也对其造成潜在影响。土耳其将继续坚持战略自主，在大国竞争中努力维持平衡，在地区冲突中适时调整政策以应对不利局面，积极拓展国际技术合作，力保交通与能源枢纽愿景，打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方案，保持自身地缘政治竞争力。

【关键词】 地缘政治变局 中等强国 大国竞争 多元平衡外交 土耳其

【作者简介】 邹志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美国外交变局与中美全球战略博弈研究”（22JJD810004）和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中美在中东地区的‘新基建’竞争及对策研究”（2022BGJ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等强国一般是指拥有相对较强的综合国力和超出地区层面的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地区大国，韩国、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沙特、土耳其、巴西、南非等国都曾被列入中等强国行列^①。外界高度关注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大国竞争、地缘政治格局等议题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其拥有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或国际影响力，可以为地区和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甚至能够引领全球议程或塑造国际格局，但对其角色与作用的局限性关注不足^②。从现实来看，中等强国明显受制于有限的国家实力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既可能带来新的战略机会，也会增大这些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西方媒体和学者常将中等强国划分为西方中等强国和南方中等强国，认为前者更认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愿意维持现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而后者希望改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部分国家被称为修正主义中等强国，如伊朗和土耳其^③。所谓南方中等强国，主要指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经济体量较大、国际影响力较强的国家，这类国家既非传统发达国家，也非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往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积极寻求变革，并倾向于与各方特别是其他新兴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网络，随着技术突破和资源掌控能力增强，这些国家正通过技术、资源和话语权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学界相关研究多关注这些国家

① 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 et al., eds., *Rethinking Middle Powers in the Asian Century: New Theories, New Ca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John de Bhal, "Rethinking 'Middle Powers' as a Category of Practice: Stratification, Ambiguity,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5, No. 3, 2023, p. 404.

② Şuhnaz Yilmaz, "Middle Powers and Regional Powers", in Patrick James, ed.,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Marion Laurence, "Middle Powers", in Nukhet Sandal,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2期；丁工：《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丁工：《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同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合作》，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Charalampos Efstathiopoulos, "Global IR and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Exploring Different Paths to Agen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 No. 2, 2023, pp. 213–232; Arta Moeini et al., "Middle Powers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in 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 March 2022.

在大国关系演变中拥有的独特优势与发展机遇，而忽视了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①。全球大国往往会在竞争中加大对中等强国的拉拢与争夺，促使中等强国追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寻求扩大地缘主导权。然而挑战也如影随形，大国或大国阵营之间竞争加剧会大幅压缩中等强国的地缘政治空间。面对大国的拉拢和争夺，中等强国传统上只能选择追随或者疏离战略，往往会丧失发挥更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条件。当前，大国竞争的升温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既为中等强国提供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和获利机会，也给她带来了较大的战略风险。对新兴中等强国的发展机遇、独特作用和国际地位，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本文拟从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对新兴中等强国的影响出发，重点分析作为新兴中等强国代表之一的土耳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而探讨其全球地缘政治角色地位与策略选择。

一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新兴中等强国

近年来，大国竞争和高强度的地缘政治冲突宣告了后冷战时代的终结。美国致力于开展大国竞争，其全球战略与地区政策均服务于大国竞争议程，加之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与美欧之间陷入对抗状态，全球大国关系从冷战结束后的相对松弛重新走向紧张态势。大国竞争的日益升级以及地缘政治的全球回归，使得中等强国的角色与作用受到更大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日益团结和重要的全球南方，新兴中等强国也成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面对选边、对冲、疏离等多种策略选择^②，新兴中等强国根据自身偏好普遍采取模糊化的平衡与对冲策略来应对大国竞争带来的挑战，积极利用新的全球战略态势获取发展机遇与现实利益，增强战略自主性和话语权。新兴中等强国还积极灵活地开展多边联合

^① Ziya Öniş and Mustafa Kutlay,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Middle – Power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Turke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2, 2017; 丁工:《中等强国合作体:机制成因、功能属性及行为趋向》,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3期;周明、李琼:《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4期。

^② 孙通、刘昌明:《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逻辑:基于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与利益偏好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4期。

外交，引领了全球南方新不结盟运动的兴起^①。

然而，新一轮全球地缘政治变局表现出更为复杂多维的面貌，特别是受到大国竞争、地区冲突和新兴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三大因素紧密交织，大国竞争全面渗透至地区冲突、国际技术合作之中，地区冲突、新兴技术发展也深刻影响大国间关系，并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大国竞争的全球化、地区冲突的外溢化、新兴技术合作政治化背后都蕴含着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逻辑，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均具有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世界各国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新一轮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之中，新兴中等强国更是面对大国竞争升级带来的体系结构压力、大规模冲突导致的地区秩序重构压力和技术飞速发展及其政治化带来的地缘经济挑战。

第一，大国竞争的全球化。当前大国竞争持续升级，呈现出鲜明的全球性、战略性特征，是中等强国所面临的基本国际环境。中等强国既迎来国际地位提升的外部机遇，也面临日益增大的结构性体系压力。从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政府逐步调整其全球战略，在全球各地区各领域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发展视为优先目标。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宣称，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②。美国兰德公司2023年发表了大国全球战略竞争系列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从大国竞争角度反思和调整在印太、欧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的政策，中国是核心关注对象^③。大国竞争覆盖了经济、安全、科技、基础设施、地缘政治等所有关键领域。美国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深刻影响了大国间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造成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在此背景下，

① 黄忠、宋晓丽：《“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9期。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

③ Raphael S. Cohen *et al.*,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Outside the Indo-Pacific and Europe”.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969-1.html,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Marta Kepe *et al.*,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Africa”.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969-2.html,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Ashley L. Rhoades *et al.*,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969-3.html,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Irina A. Chindea *et al.*,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969-4.html,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

包括中等强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深受大国关系趋紧的影响，普遍面临日益增大的选边站队压力。新中间地带与全球南方的地位凸显，新兴中等强国是其中主要代表，其角色地位受到大国高度重视，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大国竞争强化的影响。实际上，大国竞争烈度的加剧压缩了中等强国选择的空间^①。一方面，中等强国往往不愿意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坚持战略自主意味着独自面对复杂挑战；另一方面，中等强国不得不随着大国竞争重心的变化而调整政策，能否在大国竞争的中心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其全球战略地位与外交空间。

第二，地区冲突的外溢化。近年来爆发的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产生了空前的外溢效应，中等强国在面临政策抉择的同时，也面临地区秩序重构的压力。两场冲突的外溢效应反映出当今地区冲突的新特征，其影响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之内，而更具全局性、系统性。一方面，俄乌冲突的爆发及其长期化深刻改变了大国关系格局和欧亚地区形势，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了重大冲击。美俄竞相拉拢其他国家，中等强国普遍面临着处理与相互冲突的大国关系的复杂挑战。俄乌冲突背景下，土耳其、沙特、埃及、南非、巴西、墨西哥等新兴中等强国都不愿意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它们的立场选择对于冲突结局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十分重要^②。但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新兴中等强国两边交好的务实外交更加困难。在俄乌冲突中，中等强国往往不得不在俄乌双方中作出立场和政策选择，却又缺少明确的选择依据^③。另一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效应推动中东地区进入冲突潮，安全优先性和地缘政治敏感性更加凸显，也让世界更加分裂。此次巴以冲突呈现长期化和外溢化趋势，各方势力卷入其中，加大了治理难度^④。巴以冲突持续外溢，导致黎以冲突、红海危机、以色列与伊朗

① 张弛：《“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载《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3 期。

② Angela Stent, “The West vs the Rest: Welcome to the 21st – Century Cold War”.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02/ukraine-russia-war-un-vote-condemn-global-response/>,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③ 张一飞、甄选：《“左右逢源”何以可行：中等强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对外政策选择》，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④ 孙德刚、马文媛：《巴以冲突的治理难题与前景分析》，载《和平与发展》2024 年第 1 期。

冲突等全方位地区危机，地区格局出现新调整，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航运、能源、供应链安全造成轮番冲击。两场冲突共同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安全议题更加凸显。新兴中等强国对持续的冲突与人道主义危机深感忧虑，对以色列及美国日益不满，甚至采取了法律和经济行动，但同时也不得不审慎评估局势变化，避免对自身经济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第三，新兴技术合作的政治化。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展人类的活动空间，制海权、制陆权、制空权和制天权等重要地缘政治概念相继出现，而地缘政治竞争也始终是推动世界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之一^①。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加速发展，信息通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等众多领域的技术进步正在产生系统性影响，其中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的快速发展更是引领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与议程。与此同时，市场化力量推动新兴技术的全球扩散与国际合作，而政治化力量又扭曲了新兴技术的全球自由流动与正常的国际合作。技术发展在地缘政治的联系日益密切，新兴技术的国际合作出现政治化倾向，深刻影响中等强国的对外关系与发展前景。技术与主权、技术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受到更多关注与研究，有学者提出地缘技术分析框架，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②，认为技术变革和产业竞争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技术地缘政治正逐渐成为大国技术竞争的主要内容^③。一方面，各国能否抓住或跟上全球科技发展潮流，在新兴技术产业链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发展前景。新兴中等强国均拥有加快发展科技的战略愿景，近年来纷纷将信息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新能源等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在自身科技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希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引入国际先进技术，为本国经济注入持续增长动力，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国际科技合作与全球地缘政治纷争交织在一起，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推动了新兴技术合作的泛政治化，也影响中等强国的对外政策与合作选择。面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美国加大对战略伙伴的技术转移，禁止对竞争者的技术输出，以维系霸权^④。欧盟也以战略化、安全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看

① 田野：《走向整合的国际竞争理论构建：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与国际制度竞争》，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

② 赵明昊：《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5期。

③ 管传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地缘政治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9期。

④ 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

待国际科技环境，遵循地缘政治内外权力平衡策略，对内发展关键战略性技术，对外强化科技治理和科技规约体系^①。在此背景下，技术领域的全球治理愈显重要，中等强国在新兴技术合作领域面临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最终也将影响其发展前景。

二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对土耳其的挑战

土耳其是一个拥有独特地缘战略地位的新兴中等强国，是稳定欧亚结合部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角色。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将土耳其列为欧亚大陆这一全球大棋盘上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②，所看重的就是土耳其独特的地缘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角色经历了数次变化，从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前哨”逐步转变为沟通东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桥梁”，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执政后开始追求“地缘政治中心”角色。土耳其期待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从“侧翼国家”转变为“中心国家”，并最终成为“全球行为体”^③。在世界大国之间多方制衡、斗而不破以及地区大国力量分化组合的背景下，土耳其的多元平衡外交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表现活跃，获得了突出的国际影响力。

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的重要代表，学界对其地缘战略优势与发展机遇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④。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中等强国，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抱负长

① 卓华、王明进：《技术地缘政治驱动的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科技政策》，载《国际展望》2022 年第 4 期。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0 页。

③ Faruk Yalvac, “Strategic Depth or Hegemonic Depth? A Critical Realist Analysis of Turkey’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2, 2012, p. 168.

④ Emel Parlar Dal, ed., *Middle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Rise of Turke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Aylin Gürzel, “Turkey’s Rol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layer and its Power Capacity: Turkey’s Engagement with Other Emerging States”, *Revista de Sociologia e Política*, Vol. 22, No. 50, 2014, pp. 95–105; 丁工：《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5 期；董漫远：《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载《西亚非洲》2022 年第 2 期；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载《外交评论》2022 年第 2 期。

期受到自身实力的内在制约，综合国力不足以支撑其中心大国的雄心。面对大国竞争、地区冲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新变局，世界各国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不得不适时调整外交政策和寻找自身的新角色，土耳其也不例外。如果新兴中等强国不能将自身的雄心与内在能力、外在权力平衡动态保持一致，不加克制地推行积极进取战略，则很可能无法获得自己所期待的国际地位^①。

第一，大国竞争为土耳其提供了经济与政治上的获利机会，但其在大国关系网络中身份尴尬，远离全球权力竞争的中心舞台。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关系的日趋紧张一度让土耳其认为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土耳其认为，在经济上可以填补美国限制中国商品后出现的市场空缺，有利于其商品出口；在政治上有利于提升外交地位，利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好地推行其务实平衡外交，左右逢源，多方获取实际利益。然而，土耳其未能大幅提升对美出口，对美欧来说其地缘经济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更不是土耳其能够取代的。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在中美俄欧等各方之间保持平衡与模糊立场，与中美两大国均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面临着西方要求其明确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中美两国密切交往的中等强国在两国之间维持平衡的空间也被压缩^②。与此同时，土耳其远离亚太地区这一大国竞争造就的地缘政治中心舞台，在中美竞争中处于插不上手、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更难以像印度那样从中获益。一方面，土耳其缺乏与美国一致的西方价值观，土美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情绪高涨，这引起美方不满，也无法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承担有意义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与中俄之间缺乏足够互信，短期内无法加入上合组织或金砖合作机制，其还主导成立“突厥语国家组织”，与中俄竞争地缘政治影响力，更缺乏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合作的有力抓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网络中，土耳其的角色也遭遇挑战。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美国联合盟友先后推出多个基础设施

^① Ziya Öniş and Mustafa Kutlay,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Middle – Power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Turkey”, p. 179.

^② 王高阳、康鑫宇：《从追随到对冲：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沙特的战略转向》，载《国际展望》2024年第5期。

建设倡议,试图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竞争,包括 2021 年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2022 年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以及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倡议等。2023 年 9 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上,美欧国家联合印度推出了“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倡议,提出建设一条连通亚欧之间贸易的新路线,从印度经阿联酋、沙特、约旦和以色列通往欧洲。此外,俄罗斯一直倡议开发“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目标是连接俄罗斯、里海沿岸国家和伊朗等国。土耳其在上述相互竞争的重大基础设施倡议中都不占有关键地位。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进展较为缓慢,又难以在“南北国际运输走廊”中发挥作用,“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倡议更是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倡议形成替代关系,对于一心希望打造欧亚基础设施枢纽的土耳其来说构成重大挑战。无法在世界主要基础设施倡议中占据关键地位,不仅意味着土耳其力推的“中间走廊”倡议难以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和商品流入,更意味着土耳其在未来的地缘经济格局中面临边缘化前景。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贸易线路不仅可以满足贸易往来需要,也是地缘战略竞争的反映^①。因此,“印度—中东—欧洲走廊”的提出让土耳其感到震惊、愤怒和担忧,土耳其成为唯一公开对此表达不满的国家。埃尔多安第一时间批评了这一排除土耳其的计划,表示“没有土耳其,亚欧之间的任何走廊都无法建立”^②。

第二,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中表现活跃,但难以扮演关键角色并影响局势发展,无法实现其预期的地缘战略目标。

俄乌冲突在凸显土耳其独特地位的同时,也压缩了其平衡外交空间,使之面临艰难的地缘政治抉择,无法扮演有效的斡旋者角色。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平衡力量,而其发挥平衡作用的关键不是被广泛认为的欧亚大陆桥梁,而是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桥梁^③。出于战略上的相互借重和务实合作的需要,近年来土耳其与俄罗斯不断靠近,在经贸、能源和叙利亚问

① “Turkey Floats Alternative to G20’s India – Middle East Trade Corridor Plan”. <https://www.ft.com/content/0673f928-dec9-48fb-83b3-8b868a9dcbbe>,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10 日。

② “Erdogan Says India – Gulf Transport Corridor Won’t Work with Turkey Exclusion”. <https://www.newarab.com/news/turkeys-erdogan-slams-india-gulf-israel-transport-corridor>,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10 日。

③ Saul B. Cohen, “Turkey’s Emergence as a Geopolitical Power Broker”,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2, No. 2, 2011, p. 217.

题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扩大。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实行平衡外交^①，利用其多元身份在各方之间纵横捭阖，通过诸如斡旋俄乌和谈、促成恢复俄乌粮食出口的“黑海粮食倡议”，提升了国际地位，其谨慎平衡的外交策略最大限度维护了国家利益^②。俄乌冲突后，美欧对土耳其的态度也出现了积极变化，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然而，俄乌冲突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重大冲击，土耳其面临着管理与西方和非西方大国关系的复杂挑战^③。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完全破裂，这极大地压缩了土耳其采取平衡政策和机会主义外交的空间，斡旋者角色也无疾而终。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不参与西方对俄制裁，不愿也无法与俄罗斯完全切割，受到西方的指责。因此，土俄关系的战略韧性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土耳其的多元平衡外交更是面临重大挑战。同时，由于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显然更靠近“全球南方”或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土耳其与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其不仅无法获得西方的完全信任，希望借助斡旋俄乌冲突而保持平衡立场、提升地缘影响力的努力也难以成功。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前后的中东地缘政治变局中，土耳其无力影响局势发展，并不是影响当前中东地区格局的关键行为体。虽然土耳其被公认为是中东地区强国，但其既未在美国的新中东战略中占有关键地位，也缺乏影响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的重大影响力。一方面美国的新中东战略构想主要以以色列与阿拉伯盟友为重塑联盟体系的主要支点，并服务于大国竞争议程，土耳其并不占据关键位置。美国致力于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以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约旦为主要成员塑造一个新的地区盟友体系。特朗普第一任期更是前所未有地推行了一系列“以色列优先”的中东政策，力推“亚伯拉罕协议”^④。拜登政府实质上继续推动这一计划，将沙特与以色列建交作为核心目标，不过被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所打断。在战略收缩背景下美国力图以“阿拉伯

① 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

② 刘中民、曾卓：《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1期。

③ Ziya Öniş, “Historic Missed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for Renewal: Turkey – EU Relations in a Post – Western Order”, *Turkish Studies*, Vol. 24, No. 3 – 4, 2023, pp. 691 – 713.

④ 汪波、伍睿：《“以色列优先”与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内在逻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3期。

版北约”重塑中东联盟体系，整合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友共同组成以美国为关键节点的网络状中东联盟体系^①。同时，美国的新中东战略服务于大国竞争议程，致力于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以色列与阿拉伯盟友在其中的地位也更为关键。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强调伙伴、地区融合、冲突降级和民主人权，首次将大国战略竞争即遏制中俄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核心和中东外交的中心任务^②。另一方面，面对 2023 年 10 月 7 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土耳其从最初的谨慎平衡立场与试图从中斡旋的政策，很快转向激烈反以，试图扛起道义大旗，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埃尔多安公开为哈马斯辩护，强烈谴责以色列，2023 年 11 月宣布召回驻以大使；2024 年 5 月，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8 月，向国际法院提交申请，正式加入南非发起的针对以色列涉嫌“种族灭绝”的诉讼案；11 月，埃尔多安宣布与以色列“断交”。虽然土耳其高调介入地区冲突，但其无力改变巴以战场局势。在当前的中东地区冲突中，以色列、伊朗与美国是最核心的三方力量，美以同伊朗的博弈与对抗是决定地区格局走向的关键。土耳其对当前中东局势缺乏实质性影响力，也无法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响应，难以实现其塑造地区领导权的地缘政治目标。

第三，全球能源格局因俄欧关系变化和绿色转型而出现重组，这威胁到土耳其的能源枢纽愿景。

联通中东、中亚油气产地和欧洲消费市场之间的能源运输枢纽地位，是支撑土耳其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土耳其一直希望依托其关键地缘位置打造欧亚能源枢纽，既可保障自身能源安全，也可以借此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服务于其寻求成为“中心大国”的外交目标。然而，土耳其的能源走廊地位和能源枢纽愿景正在受到国际能源格局变化与全球能源转型的双重冲击。当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迫使土耳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既要满足其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也面临日益重要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相关风险^③。

① 张帆：《超越地区霸权——试析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2021 年第 5 期。

② 唐志超：《美国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调整的动因、特征与前景》，载《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 期。

③ Şuhnaz Yılmaz, “Facing New Security Threats in an Era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s: Turkey’s Challenges of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Turkish Studies*, Vol. 24, No. 3 – 4, 2023, p. 714.

一方面，欧盟大幅削减并基本切断来自俄罗斯的油气供应，使得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土耳其能源枢纽计划受到直接冲击。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欧能源脱钩，双方渐行渐远，欧洲开始重新倚重美国及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①。未来，即使土耳其对欧输气能力获得提升，但市场可能已经大幅萎缩或因欧盟拒绝而不复存在。美欧还对在土耳其建设俄罗斯天然气输欧中心的计划发出了严厉警告。此外，海湾产油国的油气资源一般经过海上航线对外出口，对和土耳其开展能源过境合作缺乏充足动力。在东地中海天然气争夺中，土耳其处于孤立地位，以色列、埃及、塞浦路斯、希腊等国组建了排斥土耳其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并建设了直接通往欧洲的海底天然气管道，成为绕过土耳其的输欧能源新选择。中亚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虽然短期内对欧洲来说重要性上升，但始终面临着“向东走”的分流压力，长期而言难以单独支撑起土耳其的能源枢纽地位。在此背景下，经由土耳其的现有输欧能源运输路线面临欧洲消费下降和被新的替代方案联合挤压的风险，这都将削弱土耳其作为欧亚能源走廊的地缘价值。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压力下的全球能源转型对土耳其提出了复合挑战。2015年《巴黎协议》签订后，全球100多个国家承诺到2050年或2060年实现碳中和，特别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态度积极。这推动了全球碳减排技术和绿色、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实践，欧洲国家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需求将逐步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绿色转型趋势必然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前景。欧洲本就是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的急先锋，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更加速了欧洲向绿色低碳的转型进程^②。面对欧洲削减传统化石能源需求的前景，土耳其联通欧亚的能源枢纽重要性呈现下降趋势，而土耳其未能跟上全球新能源技术发展的步伐也将增大其在能源领域面临的挑战。

第四，土耳其在新兴技术革命与产业发展热潮中未能抢占有利地位，国际技术合作的政治化也对其带来潜在冲击。

① 方瑞瑞、刘贵洲、冯连勇：《依赖与摆脱依赖：欧洲能源的宿命——俄欧能源关系视角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2期。

② “EU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War in Ukraine: From Sprint to Marath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3/739362/EPRS_BRI\(2023\)739362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3/739362/EPRS_BRI(2023)739362_EN.pdf),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EU”.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3/754623/EPRS_BRI\(2023\)754623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3/754623/EPRS_BRI(2023)754623_EN.pdf),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

土耳其未能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新兴产业链中占据关键地位，也不是各方争夺的关键市场，还在新兴技术革命背景下面临技术主权与地缘技术挑战。土耳其并未特别受益于西方旨在遏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地位的“寻找新盟友”政策，这在欧美支持的大型互联互通项目中表现明显，而技术领域脱钩的前景可能会给土耳其带来新的障碍^①。近年来，土耳其的军用无人机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广泛认可，但在其他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较为滞后。总体上看，土耳其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长期徘徊在中低端，技术和产业升级缓慢，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近年来受限于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有限的投资能力，土耳其难以及时跟上全球科技革命与发展的潮流。土耳其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格局中缺乏足够的国际吸引力，在国际科技合作网络中地位不高，也不是全球科技领先大国和公司争夺的关键市场，无法在世界新兴技术产业链与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土耳其在未来的技术地缘格局中或将被边缘化，甚至最终可能丧失技术主权。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及其与美欧之间的复杂矛盾，制约了土耳其的国际科技合作选择，从俄罗斯、中国引进国防与科技产品受到美欧制裁打压，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又因双边关系的矛盾经常性地受到限制甚至制裁。正如土耳其在引进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参与研制美国 F-35 战机时的遭遇那样，土耳其的国际技术合作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均受到突出的地缘政治制约。

三 土耳其的地缘战略选择

20 世纪，土耳其因独特的地缘位置深受各方重视，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小心谨慎地选择自身的应对策略，先是主动利用大国关系维护了民族独立，又适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两极格局下地缘战略地位得以彰显。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土耳其不满足于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和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开始实行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日益自信地尝试塑造中心大国地位。2002 年正发党执

^① Çağdaş Üngör, “Turkey between Two Worlds: Geopolitics of China’s Rise and the Western Response”. <https://tr.boell.org/en/2024/02/29/turkey-between-two-worlds-geopolitics-chinas-rise-and-western-response>,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政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从提倡相互依存转向战略自主^①。美俄的持续博弈为其实行平衡外交提供了条件，而美国的中东战略收缩和同时期发生的中东变局为土耳其“回归中东”、争夺地区领导权创造了条件。土耳其一度在叙利亚、伊拉克、东地中海、利比亚、海湾和外高加索等多个方向强势出击，成为影响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角色之一。与此同时，土耳其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日益复杂，叙利亚局势、库尔德问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均超出了其能掌控的范畴，受到大国关系变化、地区大国复杂博弈的结构性制约。

当前的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技术变革等因素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新变局使土耳其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舞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大国竞争烈度快速提升，俄乌冲突后的西方对俄全面制裁和战场对抗也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美俄博弈，中东局势因新的地区冲突与大国竞争而呈现出新特点，全球能源格局因俄欧关系变化和绿色转型而出现重组，新兴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国际科技合作则出现政治化趋势。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受制于日益趋紧的大国关系、更加激烈的地区冲突以及能源和技术因素变化，土耳其的平衡外交空间趋小，更加难以实现“中心大国”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必须不断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发展态势。

土耳其将继续实行平衡务实的地缘战略，坚持战略自主，避免选边站队，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其目标策略，力争在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新兴中等强国均希望确保更大的自主权，即使可能因此消耗更多资源，带来某种形式的孤立或对外依赖^②。而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③。复杂的周边安全局势和对外关系促使土耳其高度重视战略自主，只有实现更大的战略自主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安全和施展地缘政治抱负，而不完全受制于人。动荡的地区环境加深了土耳其的安全危机感，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必须在经济、军事和社会结构方面保持强大，周边地区的每一次事件和危机都

①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 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 1085.

②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Understanding Oscillation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athways to Unusual Middle Power Activ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12, 2021, pp. 3051 – 3069.

③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

与土耳其密切相关^①。土耳其与美欧的矛盾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带来的复合挑战促使土耳其加快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增强了发展独立国防工业的内在动力。近年来，武装无人机成为土耳其国防出口的明星产品，国防工业国产化率的提升也增强了其战略自主的底气。土耳其国防工业自主化有助于提升其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塑造地区军事大国地位，也有助于增强国内民众的认可和支持^②。然而，土耳其是否能够在全球地缘政治变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关键在于其能否在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技术变革等层面找准自身定位和抓住发展机遇，在不同层面和领域适时调整外交政策，有效应对全球地缘政治局带来的复杂挑战。

第一，在全球层面，土耳其力图在大国竞争中保持相对平衡，维持与所有大国的务实合作，降低大国竞争带来的负面冲击。继续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对土耳其来说依然是最为有利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土耳其强调与西方之间的制度性联系，缓和与美欧关系。虽然过去的十余年中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是美欧依然是其安全与经济重心所在。当前，土耳其希望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西方投资与援助，在安全上维系与西方之间的联盟关系。多年来，土耳其推行强势外交，冲击北约联盟体制，围绕本国战略利益多次与美国讨价还价，使其成为北约事实上的“特殊成员”或“特殊问题”^③。土耳其在北约事务、入欧等问题上与美欧谨慎博弈，在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与西方闹翻。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与瑞典紧急加入北约的申请一度遭到土耳其的强势阻挠，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博弈，在获得两国政府在反恐和国防出口领域合作承诺的情况下，土耳其最终松口放行。面对北约，究竟是战略自主优先还是联盟关系至上，这受到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态势的共同影响^④。虽然土耳其与美欧之间

① “Türkiye Must Be Strong with Its Economy and Military”.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35859/turkiye-must-be-strong-with-its-economy-and-military>,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10 日。

② 刘亚萍、蒋真:《从“美国化”到“自主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3 期。

③ 许海云、田甜:《北约联盟体制中的“土耳其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12 期;董漫远:《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载《西亚非洲》2022 年第 2 期。

④ 郭长刚、梁莹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1 期。

矛盾重重，然而双方依然相互需要，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能也不愿脱离西方。另一方面，土耳其适度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积极拓展与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联系。土耳其不放弃与中、俄、印加强联系，模糊土俄关系的战略性，表现出向亚洲靠拢的积极姿态。土耳其从 2022 年起连续参与上合组织峰会，2024 年正式提出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联互通，重新力推 2019 年提出的“新亚洲倡议”，以实现多方借力和获取现实利益的目的。土耳其寻求利用大国战略竞争为其重返世界权力中心创造条件，它既不愿反对中国，也在可能情况下寻求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为自己留出空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①。在特朗普再次执政背景下，能否在日益趋紧的大国关系中坚持战略自主，尽可能不选边站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土耳其的地缘战略角色。

第二，在地区层面，土耳其根据中东局势变化快速调整政策以对冲不利局面，并通过在中亚、非洲等地的新地区外交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一方面，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利用“和解潮”缓解地区外交困境，又在新一轮巴以冲突背景下通过高调反以色列提升国际威望，谨慎应对地区冲突外溢化挑战。土耳其先是借助 2023 年中东“和解潮”的有利态势，通过与中东多国关系正常化缓和了之前的地区孤立局面，先后实现了与埃及关系的正常化，恢复和加强了与阿联酋、沙特的合作关系，与叙利亚改善关系。2023 年 7 月，埃尔多安获得连任后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三个海湾国家，达成了数百亿美元的经济与国防合作协议，从海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投资与金融支持，有助于其稳定国内经济与汇率。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高调支持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并限制与以色列的贸易往来甚至断交，借此拉近了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干扰了美国围绕以色列重塑地区盟友体系的既定战略。当然，这也恶化了土以关系并可能影响到土美关系的前景。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中亚、非洲等地加强多元化地区外交，拓展地缘影响力。土耳其争当“突厥语国家领袖”，利用突厥语国家间互联互通、能源与贸易合作增强地缘影响力，并在欧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背景下积极推动合作扩展至政治和安全领域。同时，土耳其不断加大对非洲、亚洲中小国家的外交力度，通过贸易联系、国防出口、对外援助拓展新的国际空间。近年来埃尔多安频

^① Christopher S. Chivvis *et al.*, “Türkiye in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10/turkiye-in-the-emerging-world-order?lang=en>,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繁出访非洲国家，大幅增加土耳其在非洲的使领馆，将土耳其—非洲经济和商业论坛、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制度化，提出将土非贸易额提升至 500 亿美元，加大对非发展援助，在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建立军事存在，非洲成为土耳其拓展地缘影响力的重要方向。在中东、中亚和非洲等地，土耳其利用无人机出口强化军事政治关系、间接干预地区冲突，塑造了有利于土耳其的地区地缘格局，拓展了地缘政治影响力^①。

第三，在技术层面，土耳其努力拓展新兴技术合作，力争融入全球新产业链供应链塑造进程，应对技术政治化挑战，保持自身地缘经济竞争力。首先，拓展国际技术合作。土耳其认识到先进技术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技术升级改善产业结构，转向以先进技术和研发为基础的高附加值产业，在伊斯坦布尔设立科技中心，通过资金投入、人才补助和税收减免吸引更多科技人才投资创业。土耳其政府成立了数字转型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21 ~ 2025）》，旨在培养更多的人工智能专家，支持相关研究、创新与创业，打造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加强国际合作等^②。土耳其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 and 战略自主优势，吸引世界各国高技术企业投资，加强新兴技术与产业合作，同时与美欧及中国在信息通信、新能源等领域保持合作关系，规避技术政治化，在全球新技术产业链塑造中寻求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024 年埃尔多安提出了一项高科技投资计划，承诺提供 300 亿美元支持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能源技术等关键产业发展，推动土耳其成为全球高科技发展的领导者^③。

其次，力保能源枢纽愿景。面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化与能源转型带来的冲击，土耳其不放弃欧亚能源枢纽角色，更加重视来自中东、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输入，并致力于将土耳其打造成国际能源贸易中心。土耳其谨慎维持从俄罗斯的油气进口，加大了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等国的能源合

① 李捷、冀保冰：《军用无人机出口在土耳其进取性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载《西亚非洲》2024 年第 3 期。

② “Turkey: National AI Strategy”. <https://oecd.ai/en/dashboards/policy-initiatives/http:%2F%2Faiipo.oecd.org%2F2021-data-policyInitiatives-26590>,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③ “President Erdogan Unveils High Technology Investment Program”. <https://www.invest.gov.tr/en/news/news-from-turkey/pages/president-erdogan-unveils-high-technology-investment-program.aspx>,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作。在东地中海地区海上天然气开发中，土耳其在不放弃争夺海上权益的同时也放低了姿态，寻求加入国际天然气运输计划，伺机瓦解东地中海地区的“反土联盟”，避免被完全孤立。

最后，积极应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替代方案的挑战。在俄乌冲突使经过俄罗斯的中欧班列线路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土耳其力推的“中间走廊”倡议获得了更大机遇，跨里海走廊的货运量高速增长，其希望加强“中间走廊”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借机加快推进跨里海走廊建设。面对“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倡议的竞争和因新一轮巴以冲突受到影响的红海航线，土耳其力推经过伊拉克连接海湾国家的陆上交通走廊“发展之路”，该倡议通过伊拉克将土耳其与海湾地区联系起来，向东可以从伊拉克巴士拉经海上到达印度西海岸，向西从土耳其通往欧洲国家，最终可达英国伦敦^①。为此，土耳其努力争取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伊朗等国的支持，卡塔尔和阿联酋已经承诺参与其中，增强了这一方案的竞争力。

结 语

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强调权力斗争和资源争夺，特别是对关键地理空间、关键资源、关键国家的争夺，借此增强本国权力、利益和影响力，乃至谋求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权。对新兴中等强国来说，当前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世界大国关系变动、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技术进步的复杂变迁中找准自身定位与角色，并根据其特色优势、外交关系、外部环境等适时地调整地缘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在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中等强国需要提升战略自主，有效应对全球与地区地缘格局的多重压力，跟上世界技术变革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战略选择对新兴中等强国群体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20 世纪以来，土耳其凭借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而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发挥出了远超出自身国家实力的国际影响力。进入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在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依托自身增强的国家实力而寻求自主扮演地缘枢纽和中心大国角色。

^① “İrak, Türkiye, Katar ve BAE’den Kalkınma Yolu Projesi İçin İmza”. <https://www.dunya.com/gundem/irak-turkiye-katar-ve-baeden-kalkinma-yolu-projesi-icin-imza-haberi-723917>,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与许多其他新兴中等强国一样，土耳其尝试实行一条灵活务实的中间路线外交，并幻想再次成为全球权力中心。土耳其重新调整了它的东西方身份认同，校正了对外战略方向定位，然而其不仅未能摆脱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身份政治困境，反而陷入孤立境地^①。在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愿景中，“欧亚主义”日益盛行，“欧洲化”逐步被排除在议程之外，“新奥斯曼主义”也没有带来足够积极的结果^②。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追求一直受到自身实力不足和大国关系格局等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制约，当前这些制约因素愈益突出。俄罗斯与西方陷入对抗、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东地区冲突频发、全球技术变革与能源转型等因素带来的重大挑战超出了土耳其所能掌控的范围，其坚持多元平衡外交和追求地缘中心大国地位的宏大愿景注定难以实现，或许这就是土耳其这样的中等强国的历史宿命。有学者提出，面临国内结构性问题加剧和国际上严峻的安全挑战，土耳其应该采取“克制的中等强国”战略^③。

从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对新兴中等强国带来的挑战来看，土耳其在大国竞争中身份尴尬，在地区冲突中难有作为，在技术转型与竞争中能力有限，既无法像印度那样左右逢源，也不愿像巴西、南非那样保持超脱；既无法成为中心大国，也不愿做边缘角色。相对于印度、巴西甚至南非，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性、体系性色彩不足，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不仅无法成为中心大国，也难以扮演有效的平衡者或中间人角色。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政府很可能继续利用其霸权优势特别是安全影响力，更为直接粗暴地要求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等强国选边站队，服从于“美国第一”、大国竞争优先的全球战略以及更为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这势必对土耳其的务实平衡外交带来更大挑战。面对当前新一轮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进程中潜藏的多重挑战，土耳其也正在仔细地衡量其地缘战略选择，战略自主与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 聂侯诚）

① 刘中民、曾卓：《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② Ayşe Ö. Atmaca and Zerrin Torun, “Geopolitical Vision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2021, pp. 114 – 115.

③ H. Tank Öguzlu, “Turkey as a Restrained Middle Power”, *Turkish Studies*, Vol. 24, No. 3 – 4, 2023, pp. 673 – 690.